



公德

安徽合肥 日月

百味·杂感

前几天去超市买菜，正当我埋头挑选新鲜蔬菜时，耳边突然有人喊：“你怎么不戴口罩？”这喊声一出，惊动了正在超市里挑选商品的所有顾客。喊声就在我背后响起。我扭头一看，是位少妇模样的顾客，冲着我身旁一位年近三十、个头高高、身材魁梧的小伙子喊着。只见那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我已阳过了！”“阳过，你也要戴口罩呀！”小伙子十分不服气地说：“我都阳康了，还戴啥口罩！”“小伙子，这是公共场所！不论你是阳过了，还是阳康了，都应戴口罩！这位同志说的，也是为你好！”我在一旁插话道。小伙子一见这阵势，再没搭腔，转身朝收银台走去……

离开超市，一路走，一路想，不禁想起疫情防控放开那天上午，我乘公交车外出办事，一上车就亲眼目睹这样的小事：

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口罩挂在下巴上，手捧着手机，旁若无人，谈笑风生地坐在那，尽情通着电话；另一侧，是一位穿着比较讲究的中年男

子，坐在车厢中间的单人座位上，不仅口罩没戴，而且还一个劲地用手不停地抠着鼻子。

我坐在那默默地想着，并情不自禁地冲着他俩喊了一句：“哎！没戴口罩那两位乘客，这是公共场合，请自觉把口罩戴好！”这时也有几位乘客随着我的喊话，附和几句，俩人抬头看了看

大家，没有吭声，慢悠悠地戴上口罩。

众人皆知，新冠病毒属呼吸道传染性病毒，其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故而自我防护尤为关键，切不可掉以轻心，更不能有侥幸心理。同时新型冠状病毒又十分狡猾，只要人们稍有那么一点点疏忽，病毒就“无孔不入”。越是在这种情形下，越不可麻痹大意，要始终保持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健康心态。

常言道“不怕万一就怕一万”，况且“病从口入”。我在疫情放开这几天遇见的这几件事、3个人，搁在往常，司空见惯，也是微不足道。但疫情猖獗的严峻形势下，并非是小题大作，而是一个大是大非之题。从表象看，这是3人防护意识不强，但从实质上讲，这是3人不讲公德的具体表现。是把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予以自我的同时，又予以了别人；是对自己、

对家庭，以及对他人、对社会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所谓“公德”，就是公共道德。其涵义深刻，就是社会公众安宁和幸福的行为方式，以及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与要求。时下全社会，人人都“从我做起”，注重自我防护。这，就是当前社会普遍认同的一个最大公德。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流动。尤其是正值元旦、春节即将来临，人流量会更加增大；加之冬季又是传染性疾病的高发期，这样疫情的传播与传染风险也会随之叠加增长。

此时此刻，如果人人都能在公共场所带头重防护，讲公德，自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病毒传播的速度，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隔病毒的传播链，减少被病毒感染的概率，降低被病毒感染的人群数。

吴昌硕与合肥名士印之缘

安徽合肥 戴健

百味·人物

去上海参加长三角文化论坛，承办方邀请我们作文化考察的惟一项目就是去吴昌硕纪念馆，该馆坐落在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腹地。

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吴昌硕集“诗书画印”于一身。他还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我在馆中一张1927年11月2日即他去世前27天于病榻旁与来看望的龚心铭合影照片前驻足，由此想到他与合肥籍名士的印之缘。

吴昌硕为来自合肥的海上收藏鉴赏大家龚心铭、龚心钊进士兄弟治过多少方印，恐怕难以统计得清。19世纪80年代末龚心钊主修合肥城东北隅龚家花园，园成请举人姜筠绘制的《蘧庄图卷》，有康有为、郑孝胥、陈三立、冒广生、王尚辰、张文运、孙宝琦等40名家题跋，而引首“逍遥津”三字篆书即出自吴昌硕之手，并有其“仓硕”铃印。龚心铭娶寿州孙家鼎侄女“三姑”孙传林，得到不少陪嫁的楚币“郢爰”，他还收藏秦“商鞅变法”时期重器“商鞅量”（如今是上海博物馆镇馆之宝）。精于鉴赏的吴昌硕把玩后为龚心铭刻“楚鞅秦量”印，还特制“合肥龚氏鉴藏历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货官私印章碑帖图籍书画尺牍之记”多井格30字长印，可见与龚心铭、龚心钊兄弟交情之深。

1864年淮军主将刘铭传（字省三）在常州得西周青铜器虢季子白盘，遂运回老家在合肥西乡大潜山房建盘亭安放。1882年他携虢盘铭文拓片到苏州拜访小他8岁的吴昌硕，吴观赏后慨叹“余最为心爱”，“晨夕展玩，寝食几废”，一再临摹。他为刘铭传这位赋闲在乡、时而悠游于沪宁一带的前直隶提督刻了四方印：“臣铭传印”“省三父”“大潜山主”“文采风流”。同光体诗派领袖陈衍曾谓：“晚清诸将惟合肥刘公省三能诗文词”，是对刘铭传“有文化”的最好注解。

辛亥庐州即将光复前，李鸿章弟李鹤章之孙、李经羲长子李国松（字木公）匆匆从合肥遁往上海。这位“世家

子”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心丰富的收藏被抄，他打包运往沪上的寓所，还请吴昌硕刻了一方“肥遁庐”。吴昌硕为这位陈三立弟子及其弟李国芝，还有高级幕僚蒯寿枢等刻了80多方印。有趣的是，其中给李国松的有“合肥许承李姓第十世”“木公辛亥后所得”，把李鸿章家族本姓许、部分藏品系来沪后收入也点了出来。

为李国松印谱题签的合肥人张文运，名子开，工诗词，书法独树一帜，藏书甚丰，亦有吴昌硕治印。安徽最早的三所中学均1902年开办，其中庐州中学堂（今合肥一中）由张子开任学监，“张顺兴号”创牌时的牌匾即由他所书。合肥还有两位名扬遐迩的大书法家刘泽源（字访梁，李经羲幕府总管）、张敬文（字藜襄，省立二中校长）在沪上润格颇高，也获吴昌硕治印。青年书家吴了村（号道生）从合肥城内王箍桶巷去往申城发展，通过发奋努力居然在有正书局一次出版三本字帖，吴昌硕分别作题跋。远在大洋彼岸的“合肥四姐妹”之张充和，生前也一直珍藏吴昌硕刻印。

张广建，字勋伯，辛亥革命后任甘肃督军，武将有雅好，喜书法癖爱收藏，曾为兰州的多个亭台楼阁撰联题书。吴昌硕刻赠“勋伯五十六岁以后书”“勋伯鉴赏”印两方，估计是受蒯寿枢所托，因蒯时在甘肃张府。

记得郑逸梅《艺林散叶》中曾记合肥诗人有“三龙”，即“龙头”龚心谿、“龙身”周龙光、“龙尾”江云龙。先生《艺林散叶续编》又有“吴昌硕先生谓‘庸庸风雅，世咸讥之，实则风雅不可不有庸庸，否则风雅之流，难免饿死’。”吴昌硕与如上合肥籍名士以印交往，多是风雅中结成的朋友关系。当然，难免有庸庸风雅者，吴昌硕也自订润例，有所收入。

从新闻舆论流变看中国近代历史

安徽合肥 王寸长

百味·书评

王天根老师主编的《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流变史研究（1815-1949）》一书是一部关于中国新闻舆论史著作，属于《中国新闻舆论史研究丛书》的第一卷。该书详细考察了中国新闻舆论传播的多重面向及其历史流变，处处彰显了传播媒介与舆论及中国社会发展间的互动关系，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揭示中国近现代历程的发展趋势。

该书按照新闻舆论的发展形态划分成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815年之前，对应中国封建帝制语境下政治传播体系及古代报刊的发展；第二个时期为1815至1898年，主要内容为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与维新舆论的媒介建构；第三个时期是1898至1915年，阐述清末民初传媒格局的变迁与革命舆论的媒介建构；第四个时期是1915至1937年，围绕民初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结构中的新闻事业展开论述；第五个时期为1937至1949年，聚焦战争中政治结构调整与国家重建语境下的新闻事业。此书有别于一般新闻史著述多侧重介绍诸多报刊的存亡时间与报刊大致的内容形态。而此书聚焦传播媒介与政治舆论间的互动，重视报刊“通中外”“达新知”等政治功能的阐述，帮助读者顺着清晰的时间脉络，了解中国新闻舆论史的流变及报刊舆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

舆论（Public Opinion）一词，涵盖公众与意见两大块，最早出现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卢梭将其称为“公众意见”。近代以来，舆论的呈现形态逐渐变得多样化，传播媒介承担着重要作用。王天根老师及团队的研究将舆论史与报刊史结合起来，以报刊为主线与窗口，窥探舆论建构与近代报刊以及社会结构的变迁，推动中国舆论史研究的发

展，也为中国报刊史与近代史提供借鉴。

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外籍传教士与商人开始创办中外文报刊以传播西学，意图美化其殖民活动，中国近代化报刊便是在华外报的影响下催生的。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西方只能采取迂回宣传的策略，选择华侨密集的东南亚，比如马六甲、新加坡等地创办报刊，采取中西文化杂糅的方式向中国受众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试图进行思想渗透。中国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不得已与西方列强签订了《南京条约》，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上海、宁波等地被迫开放通商，这些城市开始涌现出一系列的商业报纸。同时，在华西人亦借助外文报刊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与文化社会发表评论，积极宣扬“中外互通”，并为鸦片贸易辩护以及煽动对华战争。在救亡图存语境下，中国大量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抗日战争时期，报刊舆论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争相抢占舆论高地。随着国民党大陆政权的覆灭，其在大陆的新闻事业也随之消失。舆论的自由程度与国家政治以及意识形态有着重要关联，而舆论亦能够影响国家政治的发展趋势。